

20 世纪初仿杜威书目对知识世界的近代化建构及其反思^{*}

□ 傅荣贤

摘要 仿杜威书目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取得独尊地位,表面上是其先进的图书整理技术使然,本质上则是国家运作诉诸科学主义话语在书目上的反映,书目所建构的知识图像被直接等同于社会改造的理想模型。于是,痛诋传统书目“卫道”理念的仿杜威书目,又确立了其自身所“卫”的科学主义公理观之“道”,书目技术的学科化、逻辑化原则转换为一种科学霸权,中国学术也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知识谱系中趋于边缘化。反思仿杜威书目的得失,遂成为反思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和中国学术在世界文化中的应有地位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 仿杜威书目 DDC 知识 学科化 逻辑化 体系性

分类号 G257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7.03.014

自 1917 年《仿杜威书目十类法》问世以迄于 1936 年抗战前夕,中国出现了以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Melvil Dewey, 1851—1931)的《杜威十进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DDC)为蓝本,或采、或仿、或增、或改、或补等“参以己意”而编制的书目约 20 余部,文题中的“仿杜威书目”,是兼及这批采、仿、增、改、补杜威书目的概称。嗣后,仿杜威书目继有庚续,今日大陆具有国标地位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以及台湾的“国标”——《赖永祥图书分类法》,与 DDC 仍存在着本质上的“家族相似性”,DDC 事实上也成为 1917 年以降我国图书分类法的圭臬。

仿杜威书目不仅意味着图书整理意义上的操作技术的革新,也将传统书目中的知识图像转换为近代化的规划方案。它以书目的形式,确认了新的知识原则和知识谱系的合法性,从而也改变了中国人对于“知识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看法。这种从技术到本体的双重改变,迄今尚未得到全面反省。

1 20 世纪初中国仿杜威书目概述

现实的图书整理技术和深层的知识信念构成了

书目的二重性本质,也是本文分析 20 世纪初仿杜威书目的主要视角。

1.1 DDC 输入之前的书目演进

梁启超曰:“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而范围亦限于天算”^[1]。这批“限于天算”的“欧籍”,有不少被列入了《四库总目·子部·天文算法》。在“西学东渐”历有年所的 1875 年,张之洞《书目答问》仍以传统书目体系为框架,酌收部分西方天文历法和军事类书籍。但“甲午丧师”之后,“东、西洋译籍逐年增多”^[2],其内容“广且博,非四部之界所能强合也”^[3]。这样,如何突破四部体系以容纳新书就成了书目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首先,西书独立编目。

自 1880 年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编制《江南制造局译书略·西书提要》以来,1889 年王韬《泰西著述考》、1896 年梁启超《西学书目表》、1897 年康有为《日本书目志》、1903 年沈兆祯《新学书目提要》等皆将西书独立编目,表明西学自具个性,不能被纳入传统书目体系。但西书独立编目回避了如何分类中学典籍的问题,由是产生了并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书目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化转型研究》(15BTQ039)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傅荣贤,ORCID:0000-0002-0696-544X,frx99@163.com。

行制书目。

其次,新旧并行。

即“酌变四部之目”,以类分旧籍;参考《西学书目表》或“暂依杜威氏之十进分类法”以分类新书^[4],形成 A+B 式的简单凑泊。例如,1909 年孔祥霖《河南图书馆分类法》以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旧籍,而新书则分“时务”及“通俗”两部,部下再分细目,如“时务”再分西政、各国史、公法,等等^[5]。但是,“新旧之书,标准难定,类分多无所依据,管理上亦多有困难”^[6],于是又产生了混合编目。

再次,混合编目。

即将中西、新旧图书统一分类和编目。与并行制相比,混合制不仅反映了统一编目和管理上的技术要求,也以书目的形式伸张了文化态度——图书背后的中西学术是一种“关系”存在。它从整体关联的高度看待中西学术,但在两者关系的定位上,则出现了两种书目选择。

第一,扩大传统四部类目以容纳“译籍”。例如,1909 年《江南图书馆分类法》以经史子集为框架,并将西书纳入其中。如史部地理类下增加“近代”“游西欧美诸国”“外国人著述”等类目^[7]。其基本原则隐含是:传统四部体系只要稍事改良,即可在空间上“无远弗届”,将西学图书纳入其中。

第二,以西方类目为框架以容纳旧典。例如,1904 年徐树兰《古越藏书楼书目》将中西书籍分为学部 and 政部,部下分目,出现了生理学、物理学、天文算学、哲学、法学、文学等反映西方学术的类名,表明西方的类目体系及其背后的知识结构才是框范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图书和学术的有效路径。与《江南图书馆分类法》相比,不仅反映了编目技术的更张,也是“世界”视域下中西文化中心的移易。而 DDC 堪称“以西方类目为框架混合编目”的极致;仿杜威书目的畅行,则表明了中西文明之核心和边缘已呈颠倒之势。

1.2 DDC 及其 20 世纪初中国的仿杜威书目

1876 年问世、1910 年被孙毓修首次介绍到中国的 DDC“是图书分类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有着如下几个特点”^[8]:

(1) 体系结构完整、严谨,囊括所有的知识领域。类目详细,层次清楚,等级分明,易于掌握和使用;

(2) 首创以号码代表类目的方法——相关排列法,把图书主题的排列、藏书及目录的排列三者统一

起来,为排架、目录组织及检索提供了方便;

(3) 首次采用小数标记制,并初步应用了组配编号法(仿分、复分),易标、易检、易排;

(4) 为分类表配备了一个详细的相关索引,为用户提供了一条按照检索的方便途径;

(5) 由美国国会图书馆、DDC 编辑方针委员会及森林出版社(现改为 OCLC)三者组成实力雄厚的管理机构,定期修订,使 DDC 不断完善。

DDC 的上述优点,导致 20 世纪初的中国学者趋之若鹜。1917 年,留美专修图书馆学的沈祖荣、胡庆生二人编制了我国首部仿杜威书目——《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嗣后,杜定友(1922 年)、查修(1924 年)、桂质柏(1925 年)、杜定友(1925 年)、应修人(1926 年)、陈天鸿(1926 年)、洪有丰(1926 年)、王文山(1926 年)、杜定友(1927 年)、王云五(1928 年)、刘国钧(1929 年)、陈子彝(1929 年)、安徽省立图书馆(1929 年)、施廷镛(1931 年)、裘开明(1933 年)、皮高品(1934 年)、何日章与袁涌进(1934 年)、桂质柏(1935 年)、尹文治(1935 年)、杜定友(1935 年)、陈东原(1935 年)、金天游(1936 年)等皆有仿杜威书目问世,其中杜定友一人即编制了四部。

仿杜威书目在 20 世纪初的大量编制,印证了朱家治 1929 年的论断:“中国图书馆现行之分类法,已受杜威之潜移默化,趋势所向,必归于十进原理之一途”^[9]。也符合昌彼得后见之明的总结:“到西洋杜威十进法传入我国,经过改良以使适合部次我国典籍后,这些过渡时期所创订的分类,遂归于淘汰,没有人再沿用它们”^[10]。

一般认为,DDC 在 20 世纪初入主中土并成为主流书目分类体系,主要是由技术上的先进性决定的,所谓“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符号整齐,便于运用与记忆;自行于世后,各国争相仿用”^[11]。上述关于 DDC 五大特点的总结也主要反映了从图书馆学或图书分类学的学科专业角度对 DDC 技术成就的肯定。它对应于晚清以来“新政”倡兴,私人性质的重藏轻用的藏书楼向公共性、开放性的近代图书馆的转型。正如刘简指出:“因往昔公私书库,多在典藏,迄至改为图书馆,一反旧习,重在流通,于是对于图书出纳、编排、入库诸手续,又不得不力求改良”^[12]。而 DDC“类目详细,层次清楚,等级分明,易于掌握和使用”等优点,尤其它创设的小数标记制分类号,极大地方便了“图书出纳、编排、入库诸手续”。

然而,书目是一个兼及技术、知识和价值观念的统一性整体,技术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意义。DDC 以文献的学科属性和主题概念的逻辑类项为依据,建构了一个包罗古今中外的宏观知识体系。由此形成的知识世界的近代化建构方案,满足了 20 世纪初中国人的普遍期待,这才是 DDC 落户中国并导致仿杜威书目畅行的关键。

2 20 世纪初中国仿杜威书目对知识世界的近代化建构

仿杜威书目不仅是分类技术上的精进,也建构了一个以学科化为核心的科学公理观,并成为观察知识世界和反思国家前途命运的行动纲领,具有十分明确的近代化指向。

2.1 对世界知识的体系性建构

首先,仿杜威书目重视对知识的逻辑等级关系和类别体系的建构。

与 DDC 一样,由若干类名结构而成的仿杜威书目也是一个严谨的等级体系。它根据逻辑原则将反映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各个类名“排列成一个具有隶属、并列关系的井然有序的概念等级体系”“可显示事物概念之间的属种关系、整体与部分关系、全面与某一方面关系以及某些相关关系”^[13]。而分类标识作为代码符号,其“完整性和等级制学科体系的完整性”^[14]相得益彰。正因为逻辑的介入,仿杜威书目普遍要求“各类标准一而不能二”^[15]“绝不能在同一步骤或阶段上用一种以上的根据(分类标准)”^[16]。

这种逻辑等级关系暗含了深刻的类别体系特征,涉及学科属性及其主题类项之间的内外关系。外部关系主要包括某学科与其他学科以及各学科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关系,内部关系主要包括某学科的进一步分层和细化问题、与次级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从而最终结构出一个既鸟瞰全局又触类旁通的逻辑秩序,也在宏观上回应了对知识的体系化诉求。事实上,DDC 就是“倒转培根体系”,它的十大类即是将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对人类知识的三分体系——历史(记忆的)、诗歌(想象的)、哲学(理性的)——倒转为“理性的、想象的、记忆的”而来^[17]。受其启发,中国学者认为传统四部体系中的“经”是知识的主干,而史、子、集作为知识的分支,分别代表了记忆的、理性的和想象的三大知识类型^[18],曲折地反映了国人对 DDC 的知识“体系

性”认可。

我们知道,20 世纪初传入我国的“欧美国家通行采用的图书分类法,大别有三种”^[19]。除 DDC 之外,另外两种分别是 1879 年美国图书馆学家克特(Charles Ammi Cutter, 1837—1903)的《展开分类法》(*Expansive Classification*, EC)和 1901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普特南(George Herbert Putnam, 1861—1955)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LCC)。“上述的三种法在 19 世纪末叶及 20 世纪初期为世界各国多数的图书馆所采用,尤其是杜威分类法最为盛行。因为杜威法仅用数字为符号,容易记忆,而且置架检取,都比较方便。不似其他两法部类繁多,并且用字母与数字两种符号”^[20]。但事实上,DDC 能够最终胜出,绝非“仅用数字为符号”等单一的技术原因,今天的《中图法》即采用了拉丁字母与阿拉伯数字的混合标识。我们认为,LCC 的“类目设置与排列完全受国会图书馆藏书情况的制约,不追求各学科的严密科学体系”^[21];而“所谓‘展开’,意即分类法可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扩充加细”^[22],两者都缺乏从“体系”高度对知识世界的规划。相对而言,DDC 是一种知识演绎系统,它的类名体系也是建构知识世界的工具,表明知识只能在结构关系中获得定位和认同,从而也迎合了中国人关于知识的体系性诉求。

总之,仿杜威书目秉承 DDC,“用逻辑的方法来建立类目之间的联系,用从总到分,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来序列类目”^[23],由此建构出一幅体系完整、秩序分明的逻辑矩阵,成为“全世界”的知识品种和类型的普遍性参照。

其次,仿杜威书目强调古今中外的知识能够也必须得到统一规划。

仿杜威书目建构的上述逻辑等级关系和类别体系是面向“全世界”图书现实及其可能的未来走向的。历史上,自《七略》以来的中国古代书目都是结合“现有”(《七录》《通志·艺文略》等也包括“曾有”)图书的分类。近代以来,包括《书目答问》《西学书目表》《古越藏书楼书目》等在内的书目也都是根据实际收罗的有限数量的图书而编制的。这种“有其书则立其类”的书目,既排除了没有为该书目所收录的实有(和曾有)文献,更不面向未来可能出现的文献。而仿杜威书目则逸出了具体“馆藏”或当下所有的框限,“产生了脱离书目形式以学科分类为基础的分类

体系”^[24]，堪称关于人类文明的宏大叙事，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

一方面，仿杜威书目在空间上立足于“全世界”的文献品种和知识类型。

仿杜威书目既以 DDC 为蓝本，又信奉美国学者克特(Charles Ammi Cutter, 1837—1903)“图书分类是集合各种图书，选择其性质相同者放在一处”的观点，“主张中西书籍应集中管理，不必因文字之不同而有所区分”^[25]。因此，仿杜威书目都兼及中西，建构了世界知识的宏观图像。例如，1917 年沈祖荣、胡庆生“将古今中外书籍分为十类”^[26]；1925 年杜定友“本世界主义，合并中西书籍”，“以中西书籍，合并庋藏，而归纳于同一分类之下”^[27]。王云五 1928 年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无论中西文务使‘一类之书放在一处’”^[28]。蒋复璁于 1929 年强调编制分类法“须冶新旧于一炉”^[29]，同年 1 月中华图书馆协会首次年会通过的四项书目编制原则中的第一条即为“中西分类一致”^[30]。因此，20 世纪初的仿杜威书目不乏以“世界图书分类法”(1925 年杜定友)、“中西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1926 年陈天鸿)、“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1928 年王云五)命名者，例如，陈天鸿《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即“以中西图书集于一处为准则”^[31]。

超越中西，在世界高度规划“全人类”的知识，反映了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定位已经从“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中西异学”转向“学无中西”^[32]。早在 1897 年，孙宝瑄即指出：“愚谓居今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地球之公理通矣，而何有中西，何有古今。”^[33]仿杜威书目致力于对全世界知识图谱的完整勾勒，正是对这种超越中西二元对立、走向世界文化大同的积极回应。它直接对应于从“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到“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34]的现实，也是对“西学西政之书”现实价值的书目回应。最迟在 1895 年“甲午丧师”之后，国人即“趋新日亟”，降及 1901 年“庚子重创”，“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35]。仿杜威书目构建了一个兼及中西的宏观知识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了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对世界知识谱系的宏观把握。

不仅如此，仿杜威书目还反映了国家全球化和

民族融入世界之林的诉求。正如 1898 年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所云：“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36]而梁启超则立志“使中国进成世界的国家为最大目标”^[37]。这种以走向世界为目标的方向感极强的努力，是整个民族国家追迹欧美，力图实现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反映，而仿杜威书目无疑迎合了这一取向。

另一方面，仿杜威书目在时间上兼及古今并放眼未来。

DDC 的类目具有伸缩性，还采用了间隔记号法(亦称空号法)，即在同位类之间预留一定数量的空号，以便将来增补新类。此外，DDC 还建立了一个定期修订的管理机构，既面向现有图书，也面向未来学术。同样，仿杜威书目矢志从宏观上设置类目，强调“立类在成一系统，以括已有、未有之书”^[38]，也超越了“当下”图书的时间断限。所以，这批仿杜威书目在编制过程中也都特别强调类目“须有伸缩性”，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图书品种和学术类型。

总之，20 世纪初的仿杜威书目相信并践行了分类技术背后的知识信念——“全世界”的现有及未来知识可以也必须得到统一控制与规划。二十余部仿杜威书目虽然各具特色，但都通过对知识世界的近代化重建，将传统知识以及民族未来知识的发展取向综合到全球化的知识体系之中，从而也积极回应了古今中外图书及其文化的“关系”问题。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被学者剖析过的‘大一统冲动’。它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人文学界所特有的那种精神总体化想像：总是想‘融合中西’、‘汇集古今’，想以一种方式将人类知识的所有类型和视角一网打尽”^[39]。

2.2 对知识世界的学科化诉求

仿杜威书目的上述逻辑等级关系和体系性特征，是以知识的学科化为建构依据的。学科化“‘以论理的关系为主’，即建立分类体系要以学科分类为基础”^[40]，并在必要时辅以载体、类型、时代、地域等有检索意义的文献外在特征。用刘国钧的话说，“图书的分类虽然以学术的性质为主，但同时不能不顾及著述的体裁……著述所用文字……著作人的国籍……著作人的时代……书名或著作人姓名的字母作为排列顺序”^[41]。所以，刘氏《中国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原则主要有①“类目不宜含有批评褒贬之意”；②“以学科分类为准绳……参以体裁的分别”，“不能利用四库之部类而增减之”；③“分类以详为贵”；④

“一方面须求理论上之圆满,一方面仍须求事实上之便利”^[42]。杜定友认为图书分类的标准主要包括“义(书之内容)”和“体(书之体裁)”^[43],也是以学科属性为主要分类原则兼及体裁等检索因素的结果。

仿杜威书目从学科化的角度对纷繁芜杂的图书及其背后知识、学术进行分类,意味着图书、知识或学术的学科化存在。时至今日,有关“图书馆的学科化服务”仍是图书馆界的关注重点,反映了“学科”视角依然是解读图书、知识和学术的关键。学科化原则坚信:所有的知识只有经过学科化的身份确认,才能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亦即,“只有形成学科,并形成严谨的学科理论体系,才可能获得学术认可和学科地位”^[44]。由此形成了对知识本质的重新界定,迎合了变革中的社会对知识的近代化需求。

一方面,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兵战”、“商战”、“学战”等各条战线上的全线败北,强化了中国人“科学实为救国第一事”(康有为语)的认知,“科学化运动”成为追求国家富强的主要手段。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更是从进化论的高度论证“科学实证”乃世界文明的大势所趋。他指出:“孔特分人类进化为三时代:第一曰宗教迷信时代,第二曰玄学幻想时代,第三曰科学实证时代。欧美的文化,自十八世纪起,渐渐从第二时代进步到第三时代,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不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45]无疑,仿杜威书目的学科化分类,既是对这一时代思潮的积极回应,也以书目自身的形态促进和巩固了社会对“科学”的确认,直接反映了特定语境下知识市场的供求关系。它迎合了社会和人类行动努力排斥非科学化的时代要求,认为客观化的科学知识才是“启民智”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家自强的唯一性手段,由此也将书目的分类体系整合到了社会和国家的范畴之中。

另一方面,学科化体现了西方近现代科学精神,也意味着图书、知识和学术都获得了理性、客观的形态,包括政治、道德、文明乃至常识等在内的人类精神成果都在学科化的新型权威之下面临着价值重估,那些不符合新型规范的内容,也以“不科学”的名义遭到了放逐。于是,“文以载道”的古代典籍,其所载之“道”便丧失了存在的依据,传统经学也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价值——因为它们“不科学”。所以,与学科属性作为主要分类原则相对应的是上引刘国钧所谓“类目不宜含有批评褒贬之意”。相比而言,

传统四部法重视“批评褒贬之意”,明显缺乏源自学科原则的客观性。同样,刘子钦在1924年提出的七条书目分类原则中,①是“应竭力与科学分类相适应”;②是“不宜有批评褒贬之意”^[46]。也正因为学科属性原则是一条客观的原则,所以,邢云林于1931年提出,“名词(类目)须专门化,须标准化,须学术化”^[47]。由此,仿杜威书目改变了传统四部书目的知识结构和社会秩序,也宣告了与政治、血亲、伦理紧密相关的天理世界观被科学世界观所取代,“弘道”的传统知识取向转换为近代的“求真”取向。

综上,仿杜威书目与其说生成了一套不同与传统书目的文献整理技术,毋宁说宣称了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它对应于“五四运动”对科学和民主的诉求,也与“科玄大战”中科学派的胜利相鼓桴。它以书目的形式解构沉沦的现实,重塑理想的未来,从而也回应了整个民族国度“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梁启超语)的努力。

2.3 襄助国家运作的理性化取向

20世纪初的仿杜威书目以学科化为原则,生产出一个关于知识的全新的组织模式,从而也襄赞了社会话语中的科学霸权,并确认了国家诉求的理性方向。杜定友曰:“举世扰乱之秋,正是我们努力之时。国事频危,岂敢稍图苟安。所以卧薪尝胆,未让勾践”^[48]。当时的书目学家都抱持着类似的家国情怀,努力以“出位之思”,在创制知识分类体系的同时,也创制社会、国家的新型运作模式。因此,书目所反映的“知识谱系的合理分化首先是一种对于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设计,其次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现代化的行动纲领”^[49],直接回应了合理性社会的建构指向以及国家理想的可能维度。

“学科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同时、全面地来理解:一是知识形态,即作为知识分类体系和科目的学科;二是组织形态,即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三是研究形态,即学科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所体现出的精神文化特质和学科的研究取向形态”^[50]。学科内涵的三重统一性意味着,仿杜威书目与当时的教育体系、学术组织乃至社会对知识生产和消费的需求等等都具有内在的深层一致性。就此而言,由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所创立的学科式理论确实是“广泛运用于特定学科研究的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它“依据产生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诸种问题组织着人们的经验”,并“得之于各门学科的框架使

知识获得了一种形式”^[51],从而也框定了人们对整个世界图像的刻画。

首先,作为“适应科学和教育双重发展需要的过程与事实”^[52]的学科化运动,既有利于培养专业人才,也促进了知识的积累。因此,仿杜威书目的学科化分类原则与学科化的近代教育体制相一致,成为学科建制赖以奠基的重要形式。民国建立后,教育部先后颁行的《大学令》《大学规程》皆提出专业取向的教育目标;《民国元年所订之大学制及其学科》《大学规程》则以章程的形式对“学科及科目”提出了具体要求。如“‘文学概论’作为重要的科目出现于‘文学门’学科之下,表明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已被纳入高等教育学科建制之中,成为一个新的知识生产类型”^[53]。仿杜威书目通过类名而建构的知识网络,甚至直接等同于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学科化知识矩阵,而它们又都对应于 1905 年废科举以及由此导致的传统知识体系的崩塌。正像 19 世纪的美国,“形成了以十进制图书分类体系(Decimal System)和印刷目录卡(Printed Cards)为特色的图书参考文献体系,有助于最新的学术成就及时得到承认和传播”^[54]一样;仿杜威书目也改变了 20 世纪初中国的知识生态,促进了知识生产、传播、组织与消费的学科化和逻辑化发展。

其次,仿杜威书目基于学科化的知识重组方案,直接对应于知识分工和社会重组,从而也为社会结构的理性建构提供了书目谱系的参照。严复曰:“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55]这里,学术分科、社会分工与国家开化相得益彰。“按照科学的规划,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由原子论个人组织起来的分工系统的自然运作。很明显,这个知识重构过程包含了对皇权和宗法社会及其合法性的解构,并为大众社会的萌芽提供了根据”^[56]。如果说,传统书目“寓褒贬,多甄别”,通过“依人列类”等手段人为干预文献地位,直接对应于“对皇权和宗法社会及其合法性”的维护;那么,仿杜威书目则以学科化的原则,建构了一个与传统非学科化的认知取向与陈述模式渐行渐远的知识体系,从而也导致现实中的人与政治、血亲、伦理不再有本质的联系。在仿杜威书目中,文献在学科和逻辑上的原子式的平等,成为个体在社会中独立和平等的参照,并成为近代政治组织的理想范型。

由此导致与知识攸关的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

改变了自我的社会身份。正像“文学是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当以这事为他终生的事业,正同务农一样”^[57],知识生产者也由“通人”变为专家,传统文人“兼济天下”的淑世情怀被社会分工意义上的职场从业规范所取代。同样,担纲知识传播的教育制度也由传统的“传道”转向传授知识,而知识消费者(受众)则由《周易》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蓄]其德”的伦理追求转变为对学科化知识的获取与接受。知识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身份和目标的改变,导致了知识与传统士大夫所追求的伦理、政治相分离,本质上反映了学科化背后的实证精神所导致的社会构造原理已经走向原子主义,个体获得了理性的、公民的自主身份从而成为形式平等的社会成员,社会和国家都被按照与仿杜威书目的知识规划相一致的原则组织起来,从而共享了学科化、逻辑化的精神结构。

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指出:“当我们鸟瞰某一时代时,这一时代才会呈现出只被一种知性潮流主宰的面貌”^[58]。仿杜威书目正体现了 20 世纪初的中国以知识生产和消费的学科化和逻辑化为指向的“主宰的面貌”,意味着广义的知识转换和文化选择在书目体制上的完成,也为社会变革和国家运作的科学原则提供了合理依据,成为创制新的理想制度的一种学理前提。

3 对 20 世纪初仿杜威书目知识世界之近代化建构的反思

仿杜威书目首先是一种分类技术的革命,它适应了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兴起。然而,书目分类技术的变化,不仅是现实编目作业的更张,也是技术背后知识与文化信念的转向,书目遂成为一个文化、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我们不能被仿杜威书目相对先进的技术所迷惑,而放弃对其精神实质的反思。总体上,作为西方近代科学产物的学科化原则,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主客二分既预设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分离,也强调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与社会历史语境的殊途,从而保证知识的客观和有效,并最终生成了一种“以观念的分类逻辑为支撑的独立知识体系和思想独立的假象”^[59]。于是,人除了理性逻辑之外的其他精神内涵(诸如情感、心理、审美)以及社会历史语境皆在排斥之列,从而也完成了对“文”所载之“道”的祛魅(Disenchant-

ment)。

3.1 从祛魅到复魅(Reenchantment)

首先,仿杜威书目的祛魅。

刘国钧在 1926 年指出:“四库类目之大弊在于原理不明,分类根据不确定。既存道统之观点,复采义体之分别。循至凌乱、杂沓,牵强附会。”^[60]然而,分析书目史的演进历程可知,几乎所有书目都有“卫道”情怀。例如,留学菲律宾、接受严格美式图书馆学教育(菲律宾当时是美国的殖民地)的杜定友在 1928 年的《类例论》中强调“类例之法则不宜存褒贬于其间”;“现代之分类为搜罗一切文献,分别部次以备选用,辨章流别、褒贬校讎均非其责”^[61]。但他 1943 年编制的《三民主义化图书分类法》(1948 年易名为《三民主义中心图书分类法》)认为:“图书分类,应有中心思想,再创立中心法制,虽仍属中外统一制中之一法,然其内容,而以‘三民主义’作中心”^[62]。同样,1926 年痛诋传统四部书目“存道统之观点”的刘国钧,在 1957 年《图书馆目录》中提出“向苏联学习”,强调“编制图书分类法必须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求,要有显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63]。

显然,刘国钧、杜定友等人只是以新的卫道代替旧的卫道。亦即,他们并不否认“卫道”本身,而只是要在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逐步协调中,重新确立书目之“道”的具体所指。然而,刘、杜二氏“道”之所指与书目技术之“能指”并没有达成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内在统一。他们编制的书目以学科化和逻辑化为旨归,在严格持守“科学性”和“实际应用性”的同时,又要突出“思想性”^[64],因而形成了书目“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凿枘。同样,今日《中图法》持守学科化及其逻辑性,它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性”,也就只能通过列“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五分法”之首;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第一大类,并规定使用推荐号‘a’在各类重复反映”^[65]等各种变通形式来体现。换言之,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层次的“道”,无法通过实证获得书目自身“科学”原则的庇护,因而只能以“酌变其例”的变通形式在维持书目总体“科学性”的基础上求其会通。

相比而言,传统书目的道之“所指”与书目技术之“能指”是高度一致的。在中国古代,《大学》将求知视为修身、治国的手段,格物所致之“知”是伦理之知,伦理则是为治平服务的。简言之,器以道为归

趋,知识只有载“道”,才是合法之“器”,知识进路必须从属于政治教化和人伦彝常的最高目标。与之相一致,传统书目并不停留在文献所记录的客观知识的层次,而是追问知识之“文”背后所载的“道”。而“道”不是知识论,因而“不客观”,无法从学科化或逻辑性的角度予以打量。所以,古代书目的类名并不是逻辑化的概念范畴;没有符号代码化的分类标记(符号代码是逻辑化的反映);分类标准也不以学科化为原则,而是根据距离“道”的远近或重要程度排列文献,等等。

总之,正像古代的道德知识与自然知识合一,传统书目也是事实与价值不分,文献的秩序与社会人伦秩序高度契合。传统书目之“存道统之观点”,就是强调“文”具有“载道”的价值,必须将“器”背后的“道”揭示出来,因而必然导致“原理不明”。而仿杜威书目以科学主义为原则,认为凡是实在的都是实证的,因而也可以并且必须转化为学科化的知识。那些无法实证的价值则必须排除在书目之外,这也是传统书目的“尊儒重道”被坚持“科学”的杜定友、刘国钧大加挞伐的根本原因。同样,1949 年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性”之所指的图书分类法被不断反思,也是“科学”原则全面介入书目分类的必然反映,说明崇尚客观的“科学”,无法接受一个不能实证的信仰。诚然,“科学方法的霸权是通过否定科学与价值的直接联系(这是科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得以成立的前提)才获得的”^[66]。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仿杜威书目没有与自身“能指”相一致的信仰“所指”。

其次,仿杜威书目的复魅。

仿杜威书目将各个门类的文献及其知识建构为一个普遍主义的“公理”世界观,它的学科化分类原则、逻辑化的标识制度等“能指”,支撑了以科学公理世界观为“道”之内容的“所指”,从而也达成了手段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换言之,仿杜威书目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重建了一个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新世界”之“魅”——默认图书只仅仅记录着学科化的知识,从而也声称了“科学”是一切知识的本质,并宣判了主体价值的无效。

显然,从传统书目所“卫”的“尊儒重道”到仿杜威书目所“卫”的“科学真理观”的“道”之内容的变迁,反映了从以社会关系的视域规划知识到以科学方法为手段规划知识的演进。如果说,前者回避了知识的客观性,后来则取消了知识主体的社会分析。

因而,两者都是不能实证信念之“魅”。在仿杜威书目中,“为什么只有实证的学科化知识才具有合法性”这个带有前提性的观念本身也是信仰层次的。进一步,自然从属于事实领域因而是可控制的,但社会则是与人类意志相关的自主领域,那么,解释自然的科学何以能够解释社会与人呢?无疑,“科学世界观用以摧毁旧制度和旧观念的实证方法也构成了对自身的整体论观念的挑战”^[67]。比如,以仿杜威书目为核心技术的近代图书馆将自身设定为知识的传递机构,必然因缺乏对培养全面人格的关怀而受到质疑。毕竟,学科化的知识是无法转化为道德规范的,人之“好”或“坏”与他/她的知识拥有没有任何必然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梁启超才“由于担心科学的过度扩张最终阉割人的道德主体性和审美主体性,因而拒绝将整个社会和人行为纳入统一的、由科学法则指导的模式之中”,并“力图缓解‘科学规划’所造成的道德危机”^[68]。

仿杜威书目的科学神话,是 20 世纪初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也是在西方“坚船利炮”入侵之下丧师失地从而追求国家强大的必然反弹。其基本思路是,西方的强大源自其科学精神,中国想要争胜于西方,唯有走科学救国的道路。所以,仿杜威书目无论多么“客观”,都不能洗白与权力的联姻。这就像传统书目所“卫”的尊儒重道之“道”,跟传统社会结构与封建政权密切相关一样。这样,仿杜威书目作为反对传统之“卫道”的利器,又成了“科学”霸权的根源,它同时发挥了祛传统之旧“魅”与建近代之新“魅”的双重功能。而不同书目所卫之“道”的内容变迁,作为不同的政治霸权之间支配与反支配斗争的结果,则反映了在知识层次和等级的划分、什么是打量知识的合理视角以及什么才是“更重要的知识”诸问题上话语权力的竞逐。仿杜威书目之独步中西,意味着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建制已经上升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主导原则,那些不遵守该原则的知识也被判定为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的叛逆。

然而,仿杜威书目视科学为沛然莫之不御的普遍真理,却无法以其自诩的实证原则确认科学话语的合法性。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也已经将“科学”推向了需要自我辩护的境地。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 21 世纪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今天,具有国标地位的《中图法》还需要“卫”那个科学主义真理观之“道”吗?

3.2 中西关系的界定

DDC 包罗中西的宏伟蓝图强烈地吸引着中国人,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这个源自西方的“世界”知识图像中,中学处于什么地位?鉴于“参照杜威分类法之连属索引,其中有关中国(China & Chinese)部门者,仅三十余目;而中西学术范围不同之处亦太多”^[69],20 世纪初的仿杜威书目几乎都做出了 DDC 中国化的努力,集中体现在:

首先,扩大中学类目。即“以杜氏为根据,间增新目,以容纳中国旧有书籍”或“直接采仿杜氏排列法及标记符号法,别创新目,以融合中国新旧图书”^[70]。

其次,将中学置于西学之前。杜定友 1925 年的《世界图书分类法》“以中国文学后于美国文学,美国史先于中国史,仍未能摆脱杜威氏原法之规定,而忽视中国地位,不免贻人之讥”^[71]。与之适成对照,皮高品 1934 年的《中国十进分类法》在类目设置上力求突出中国哲学、文化、教育、语言、文学与历史^[72],则赢得了普遍赞誉。

再次,用特殊符号标示中学图书。例如,王云五 1928 年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仍本杜威原法,加以增补,以适合中外图书之用。并创‘十’‘廿’‘土’等符号,专为插置中文书籍而设”^[73]。

最后,重视关于经部分合的探讨。一派认为应该将经学拆散列类,如杜定友 1925 年的《世界图书分类法(第一版)》;另一派则认为,“经学为我国学术之渊源,包罗万象,脉络相关,拆分他类,殊非易事”^[74]，“依类例而论,经书应当独成一类”^[75]。经学堪称中国文明的渊薮,仿杜威书目关于经部分合的争论,本质上是探讨传统学术能否被处理为西方式的学科化知识。刘国钧 1929 年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将经部分散列类,但通论群经之书则列为专类,今天的《中图法》即参考了刘国钧的意见,从而也宣告了以经学为渊薮的传统学术业已“就”西方之“范”,信仰层次的经典最终堕落为学科化的知识。

书目表面上是要将混沌无序的图书组织成一个体系,但仿杜威书目的学科化、逻辑化原则则建构了一个精确知识的经验形式,既反映了知识在学科上的层次,也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知识主体的等级。尽管仿杜威书目不懈追求中国化,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边边角角的修补,而没有改变其重建的“魅”——以学科化为原则,通过学科属性和主题概念之逻辑

类项的层层套叠,建构一个包罗中西的世界知识体系;而代码化的分类符号既回应了“公共”图书馆的检索需求,也强化了整个知识体系的学科化和逻辑化。因此,哪怕是完全“为中籍而设”、深具中国特色的沈祖荣、胡庆生《仿杜威书目十类法》,“结果仍多不能为中籍所适用,形成中籍凑入西籍之内”^[76],无法掩盖这个“世界”知识体系下的西方中心本质,“中国和西方的不平等的文化关系最终被纳入了知识领域的分类关系”^[77]。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从“华夷之辨”意义上的天下文明的宗主降格为世界视域下边缘化的一员,中国传统学术必须在“世界”视野下言说,而这种言说方式的突出特点是西方式的学科化。

例如,1924 年查修《杜威书目十进法补编》将史部列入“950 亚洲史”,子部列入“181 东方哲学”,集部列入“895 东亚各国文学”。1925 年桂质柏《杜威书目十类法》“完全译自杜氏法,惟于中国旧籍经、史、子、集、丛之未能依照者,分别穿插于相当地位”^[78],如经部各项入“181.1 中国哲学儒家”。事实上,始自 1919 年,盛极于 1923—1927 年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国故运动,本质上就是用西方学科化的科学精神审视传统知识,成为传统学术学科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于兹而还,古代知识都朝着学科化的方向努力,期以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如俞兆平指出:“‘科玄论战’后,科学派取胜了,其科学的实证论,因果关系决定论渗透进每一学科的思维领域”^[79]。与之同步,学者们在反思传统学术时普遍认为,“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80]。这样,包括信仰、道德、审美、情感等范畴都被抽象为学科化的知识概念,并被根据实证程度的高低而归属于等级分明的学科化知识谱系之中。四部体系以经为中心辐辏史子集的知识图像被根据学科原则得到了近代化的重新调整,传统的天理世界观也被科学的公理世界观所取代。

4 结语

DDC 只有 30 多个关于中国的类目,且多在三级类位,反映了杜威以西方为中心建构世界知识谱系的豪情甚至“傲慢”。尽管,仿杜威书目极其不满于 DDC 中国类目少和地位低,并进行了必要的改进,但都没有改变 DDC 以学科化、逻辑化为基础的

“中西统一分编”原则,从而也最大限度地认可了世界知识谱系中的西方中心地位。它为包括中国传统学术在内的不同文化设立了普遍标准,从而也为不同文明的等级高低奠定了书目分类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图书馆多将古籍部列为独立的部门,并用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代表的旧式书目分类其庋藏的典籍,其象征意义在于:作为与科学主义的西方文明相异质的中华传统文明一脉尚存;深得 DCC 学科化、逻辑化精髓的仿杜威书目未必是人类所有文明形态的合理框架与范型。

正像仿杜威书目取代传统书目将知识置于学科化、逻辑化的等级体系之中,实现了对世界知识的重新管控一样;今天的我们也完全可以颠覆仿杜威书目,重新规划出另一副面孔的知识图像。毕竟,任何书目都只是关于知识的人为设计和意志安排,而不是知识本身的自然面貌。这正像《四库总目》一度被视为“古今不易之法”^[81],也没有逃逸被颠覆的宿命一样。同样,包括《中图法》在内的仿杜威书目,只是 19 世纪西方科学思维主导下的临时性方案,而不是业已“毕其功于一役”的完善体系。进一步,“理论的对象既历史地变化着又在所有的变化中保持着同一性。理论不是堆放关于特殊社会事件的假说的仓库。它构造整个社会的发展图景,构造具有历史性的存在的判断”^[82]。就书目而言,它既是对知识世界的认知,也建构了全球化视野下社会/国家的组织模式,后者与书目的知识体系共享同一个精神结构。因此,对仿杜威书目的反思,也是对现有世界图像和认知框架的突破,涉及知识体系的重新洗牌和知识权力的再分配,甚至“社会的发展图景”应该是什么也可以纳入书目的思考范围。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朱维铮,校订. 北京:中华书局, 2011:145.
- 2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M]. 上海:上海书店,1984:140.
- 3 孙毓修. 图书馆(分类篇)[J]. 教育杂志,1910(2):8—11.
- 4 傅振伦. 编制中文书目之管见[J]. 北大图书馆月刊,1930(2):1—18.
- 5 刘简. 中文古籍整理分类研究[M].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81:185.
- 6 同 5:203.
- 7 同 5:157.
- 8 侯汉清. 图书馆分类工作手册[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127.
- 9 朱家治. 杜威及其十进分类法[J]. 图书馆学季刊,1929(1)2:265

—380.

- 10 吕彼得,潘美月.中国目录学[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1:232.
- 11 同5:203.
- 12 同5:156.
- 13 同8:6.
- 14 同8:127.
- 15 杜定友.校讎新义:上[M].上海书店,1991:6.
- 16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M].中华书局,1934:13.
- 17 同8:121.
- 18 黄庆莹.序.见:傅荣贤.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学研究[M].台湾:学生书局,1999:II.
- 19 同8:233.
- 20 同8:235.
- 21 同8:132.
- 22 同8:129.
- 23 同8:64—65.
- 24 同8:64.
- 25 同5:204.
- 26 沈祖荣,胡庆生.仿杜威书目十类法[M].武昌:文华公书林,1922:序.
- 27 杜定友.世界图书分类法[M].上海:上海图书馆协会,1925:凡例.
- 28 同5:236.
- 29 蒋复璁.中国图书分类问题之商榷[J].图书馆学季刊,1929(3):1—2;1—42.
- 30 杜定友.编纂图书分类法原则案[J].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1929:1—18.
- 31 同5:223.
- 32 傅荣贤.中西学术之争与晚清书目分类的历史演进[J].中国学术年刊,2015(秋季号):1—21.
- 3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0.
- 34 王国维.论政学疏稿//王国维全集:14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212.
- 3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102.
- 36 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69.
- 37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12.
- 38 同15:11.
- 39 吴兴明.“审美意识形态”与批判理论的学科化[J].四川大学学报,2007(2):5—11.
- 40 同8:64.
- 41 同16:39.
- 42 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M].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1929:凡例.
- 43 同15:3.
- 44 张应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范式冲突与超越之路——兼谈高等教育学的再学科化问题[J].教育研究,2014(12):13—23,53.
- 45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下[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804.
- 46 戴志骞.图书分类法几条原则的商榷[J].北京图书馆协会会刊,1924(1):48—54.
- 47 邢云林.评陈天鸿氏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J].文华图书季刊,1931(3):265—277.

- 48 钱亚新.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J].江苏图书馆学报,1987:专辑(初集):76—82.
- 49 汪晖.公理世界观及其瓦解.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0.
- 50 陈瑶.美国教育研究学科化的开端[J].教育研究,2015(5):141—151.
- 51 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230—231.
- 52 梁树发.学科化——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的互动[J].党政干部学刊,2010(2):3—5.
- 53 张清民.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兴起[J].江西社会科学,2008(3):100—106.
- 54 同50:141—151.
- 55 严复.论治学与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89.
- 56 同49:28.
- 57 文学研究会宣言.见: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文学运动史料选[M].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175.
- 58 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M].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41.
- 59 同39:5—11.
- 60 刘国钧.四库分类法之研究[J].图书馆学季刊,1926(1):3:9—18.
- 61 同15:4—5.
- 62 同5:204.
- 63 刘国钧.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52.
- 64 马张华.试论图书分类法思想——兼论思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关系[J].黑龙江图书馆,1981(3):38—44.
- 65 同8:96.
- 66 同49:21.
- 67 同49:20.
- 68 同49:29.
- 69 同5:216.
- 70 同5:203—204.
- 71 同5:222.
- 72 俞君立.中国文献分类法百年发展与展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17.
- 73 同5:236.
- 74 裘开明.哈佛大学中国图书分类法凡例[J].文华图书情报,1929年(1):3:271—275.
- 75 霍怀恕.近人对于经部分类意见之纂述[J].学风,1934(4):10:1—12.
- 76 同5:211.
- 77 同49:24.
- 78 同5:216.
- 79 俞兆平.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38.
- 80 陈独秀.学术独立[J].新青年,1918(5):1:76.
- 81 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225.
- 82 同31:226.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扬州,225005

收稿日期:2016年9月3日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and Reflection of Imitation of Dewey's Bibliography on the knowledge World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Fu Rongxian

Abstract: Imitation of Dewey's bibliography has achieved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China. It is due to the advanced book management technology, while in essence it is also a reflection of national practice on scientism of discourse on the bibliography as the knowledge image constructed by the bibliography is directly equivalent to the ideal model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So, after decried traditional bibliography "protect Taoist", the concept of Imitation of Dewey's bibliography has established the scientific axiom of its "protect" concept of "Tao" as the principle of the subject and the logic of the bibliographic technology is transformed into a scientific hegemony.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also tends to be marginalized in the western world knowledge spectrum. Reflection on the gain and loss of Imitation of Dewey's bibliography thus became another reflection of scientism discourse hegemony in the world and Chinese academic culture in the proper position.

Keywords: Imitation of Dewey's Bibliography; DDC; Knowledge; Discipline; Logic; System

《高校图书馆发展蓝皮书 2015》发布

2017 年 1 月 10 日,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编纂的《高校图书馆发展蓝皮书 2015》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高校图书馆发展蓝皮书 2015》是反映我国高校图书馆发展现状的第一部正式的年度报告。该书的出版有助于宏观了解和总体把握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建设现状,为各级相关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制定政策与进行决策提供参考,从而有的放矢地指导工作,引领高校图书馆事业的科学发展;有助于加强图书馆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资源共享,促进图书馆的科学管理;另外,也为高等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图书馆从业人员深入开展图书馆事业研究提供基础资料,为广大社会公众了解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渠道和窗口。

《高校图书馆发展蓝皮书 2015》内容全面而深入,包括高校图书馆发展概况、高校图书馆从业人员状况、高校图书馆年度经费状况、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状况、高校图书馆服务状况、高校图书馆科学研究与专业人才培养、高校图书馆合作与共享状况和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八个部分,以翔实的数据和事实资料完整地勾画了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特点。

《高校图书馆发展蓝皮书 2015》的数据来源主要有:教育部官方网站、“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发放的“高校图书馆发展状况(蓝皮书)调查问卷”“馆长调查问卷”、国家社科基金网站、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各高校图书馆官方网站、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数据、e 线图等。